



让留守儿童重返家庭乐园

——访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赵雯 余佳 杨婷

爱默生说，家庭是儿童的乐园。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得不到家庭的快乐——“孤独地走在乡间土地，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们的容貌变得模糊，我不知何时能见到你。”一曲《留守儿童》，是这群孩子孤独的真实写照。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据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我国有1000万名留守儿童一年见不到爸妈，260万名留守儿童一年接不到父母电话。2016年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为902万。从范围看，东部省份农村留守儿童87万，占全国总数的9.65%；中部省份农村留守儿童463万，占全国总数的51.33%；西部省份352万，占全国总数的39.02%。从省份来看，江西、四川、贵州、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等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都在70万以上。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出现，在最需要家长呵护的年龄却与父母长期分离，在看护、教育、健康以及心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2016年11月9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部署在全国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由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等8个部门联合开展，通过落实家庭监护责任、落实强制报告责任、落实临时监护责任、落实控辍保学责任、落实户口登记责任、依法打击遗弃行为等，力争到2017年底将所有农村留守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围。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他认为，童年的长度反映一个国家的高度，儿童的境遇反映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留守儿童问题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留守儿童反映了哪些“社会之痛”？“十三五”期间，我们应该如何共同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乡村儿童不再留守？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朱永新副秘书长进行了独家专访。



- “中国留守儿童的监护缺失问题已经带来严重后果，数百万的乡村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记者：一般认为，留守儿童是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产物，是我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一个社会群体。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朱永新：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报道屡见报端，自杀、性侵、失踪、意外死亡等，令人触目惊心。留守儿童的监护缺失问题已经带来严重后果，数百万的乡村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大型城市化、工业化造成的——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民进城成为必然，全世界都是如此，

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有了，所以它不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但为什么在不少国家并没有形成很大的留守儿童问题呢？因为他们没有户籍限制，父母可以把孩子带到城市里来。而在中国，户籍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们特有的。如果父母把孩子带到城里来，受户籍限制，他们吃饭、住宿、上学、看病等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父母只能无奈地把孩子留在农村，这就形成了“留守儿童”群体。这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我们不应该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政府不应该缺位。

2015年两会期间，我提出了“关于保障儿童亲子团聚权，根治‘留守儿童’问题”的提案，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协调，增加亲子团聚权的相关条文，制定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

- “留守儿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亲情抚慰；二是心理问题不能及时疏导；三是意外伤害比例高，生命健康遭受威胁；四是缺乏有效教育，留守儿童的社会认知与行为习惯存在偏差。”



记者：近年来，您对留守儿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在您看来，我国留守儿童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朱永新：我在调研中发现，留守儿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缺乏亲情抚慰。以贵州某市为例，该市的留守儿童65%一年见一次家长，16%的孩子几年没有见过一次家长。一所学校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父母多回家看望、给钱、购物、出去旅游等选项中，100%的孩子选择希望父母回家，对父母的思念是孩子们最大的“心伤”。

二是心理问题不能及时疏导。绝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祖辈生活在一起，年迈老人只能尽力照顾孩子的衣食起居，对留守儿童情感关怀相对欠缺，而农村学校普遍缺乏专业的心理辅导，留守儿童普遍缺少倾诉对象，存

在不同程度的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等问题。

三是意外伤害比例高，生命健康遭受威胁。以贵州某地为例，仅2014年一年，该地就有42.1%的留守儿童遭遇过烧烫伤、虫蛇咬伤、溺水等意外伤害。还有一部分留守儿童曾被不法分子敲诈钱物、教唆逼迫寻衅滋事、实施性骚扰等。

四是缺乏有效教育，留守儿童的社会认知与行为习惯存在偏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的调查显示，72.5%的留守儿童认为社会上存在不公平现象，53%的留守儿童认为诚实守信的人容易被欺骗，对社会的公平、正义、诚信的感知较为悲观。对某小学的调查显示，68.2%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在班级处于中等以下水平，5.4%的留守儿童存在吸烟、喝酒、打架、早恋等不良行为。

-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从国家层面调整生产布局，加大对川、豫、皖、湘、黔等留守儿童大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化当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聚集市场发展要素，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您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什么样的考虑或者建议？

朱永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农村不够，没有城市的配合无法解决。我去年曾提出一个建议，即一个家庭外出务工，必须有父母一方留下来陪孩子。留下的一方，政府可以帮助就地安排工作，或者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让家庭有效运转起来。但是后来我在调研中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我在贵州省毕节市就发现这样的问题：夫妻一方出去打工，比如男人去打工了，他在外边跟别人好上了，家里的妻子也跟别人

好上了——分开那么长时间，感情的疏离是必然的，所以让夫妇分居本身就是不人道的。2015年6月9日晚，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集体喝农药自杀，令人震惊。这四名儿童是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实际上，这个家庭的母亲并未外出打工，但是却在当地跟别人生子过活，抛弃了这四个孩子。当四个孩子去世时，母亲甚至都不愿意来看……

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我认为应从国家层面调整生产布局，加大对川、豫、皖、湘、黔等留守儿童大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化当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聚



暑假期间的毕节留守儿童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集市场发展要素,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扶持小城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乡村儿童的父母能够离土不离乡,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同时,从劳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来讲,要给农民工解决孩子的住宿和读书问题,流入地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合法权益,使得外来务工子弟能与本地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有同城待遇。但是,现在并没有法律的强制性措施,解决得并不如人意。比如,政府应该为农民工建住房,可是很多出来打工的夫妻都不能住在一起,更不要说孩子了。因此,政府要从顶层设计着手,从制度上根治。比如国家可对携带子女外出的农民工父母或一方留在子女身边的农民工夫妻进行适当财政补贴,优先就地安排另一方就业,确保夫妇有一方与儿童共同生活。80%以上的留守儿童都有孤独感,受伤害的概率比非留守儿童要大得多,养成不良行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概率大。因此,要标本兼治,大力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根源上消除留守儿童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让目前处于监护不良状态的部分留守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当然,政府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也十分复杂。有些城市农民工和孩子人口太多,政府建学校根本无力顾及。比如苏州每年打工人员的孩子2万多人,要建几十所学校才能全部解决,无论是财力、建设速度都跟不上。

国家需要解决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即流入地政府解决了这些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那么这些孩子本来在当地的义务教育费用,要不要通过教育券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支持流入地政府,这个本身也是可以讨论的。另外,如果进城务工夫妇的收入养不起孩子,那么政府的低保是否也能照顾到流动人口。现在全国还没有真正联网,异地就诊还有很大难度,更不用说教育低保在全国联网的问题,这个问题跟扶贫攻坚本身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您多次提到,要保障留守儿童的亲子团聚权,据您了解,国外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

朱永新:我到国外考察去过不少国家,在发达国家或者相对发达的国家,对此都有基本的保障和基本的法律制度要求。他们那里没有户口限制,孩子跟着父母走,社会有低保,达不到当地生活水准,政府会提供帮助,有的国家政府甚至还提供奶粉。读书也是有保障的,政府必须解决所有孩子的就学问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解决必须一步一步来,但



必须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行动起来。

记者：再说说留守儿童所在地政府，您在调研中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态度，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

朱永新：毕节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对留守儿童的管理都非常重视。比如在毕节市，凡是留守孩子都有人管，都有责任人，有的是地方政府官员，有的是学校老师，都有牌子，都有联系卡，都登记在册。当地政府现

在正大力地推行寄宿制学校，把孩子们留在学校里管起来，这是解决问题很重要的办法。很多学校还搞了亲情电话，孩子可以免费给父母打电话。在这些方面，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进步。

国务院《意见》对外出务工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加强监护监督和指导，要求公安等有关机关依法劝诫制止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依法追究失职父母法律责任。

● “加强教育供给侧改革，关注隐性公平，即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高质量的、多样化的、适合自己的教育。”

记者：不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难以疏导，他们的认知行为、习惯存在偏差。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如何给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以更有效的社会支持？

朱永新：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孩子不跟父母在一起，他们的各种心理问题出现的频率高出正常家庭孩子很多。事实上，留守儿童整个家庭出现的问题也相对比较多。因为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到了城市以后，见到的是另一个世界，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需要强调的是，在打工家庭里，远离子女的父母必须做到每天与子女沟通交流，哪怕他们每天跟自己的孩子只有一次视频电话，也会大大缓解孩子的心理问题。微信视频基本上不需要花什么钱，这为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提供了方便。值得注意的是，孩子父母本身的教育水平、教育意识、责任意识也存在不足。我在贵州调研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年轻男子到广东打工，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两人走到一起。女方有一个孩子，第一年春节他们把这个孩子带回男子老家，交给奶奶。再过一年，他们两个

又生了一个孩子，又带回老家交给奶奶。从此，孩子的父母再也联系不上了。实际上父母并未失踪，他们只是不愿意承担责任。

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工甚至连初中都没读完，接受义务教育或者接受基本教育不够，基本的价值观、社会观、家庭伦理观并不完善。这些人到了城里，也没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可能。如此，他们如何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呢？今年两会我专门有一个提案，建议加强教育供给侧改革，关注隐性公平。所谓隐性教育公平，是指高质量的、多样化的教育选择，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目前，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的教育离高质量、多样化、个性化仍然有很大差距。缺少选择，尤其是缺少优质的民办教育选择，不仅影响了教育的多样化、个性化，同时也难以激发公办教育的活力和效率。只有增加更多高质量的选择，才能从根本上推进真正的教育公平。选择的存在，民办教育的存在，不仅会增加教育多样化、个性化，同时也会激发公办教育的活力和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

加强教育供给侧改革，增加更多的教育选择，是从根本上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路径。

鼓励选择将是未来教育的方向。一方面，可以通过实行公办学校托管试点来提升学校品质。另一方面，要向民间资本开放，鼓励多元主体进入教育领域，鼓励他们办更多好学校。也要给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方便的学习机会。进城务工人员所受职业训练的缺乏，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重要障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职业技能人员严重空缺，另一方面职业技能教育生源严重不足。2014年中职教育招生已经低于44%，很多中职学校招生困难，一些学校已经无法运转。目前，各类职业培训大多采取短期集中脱产统一授课的方式，难以符合行业分散、需求

层次多的进城务工群体的要求。脱产学习难以满足“边学边干”。试想，在进城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地区，为何不能让中职学校通过夜校方式为这些人员进行培训呢？可以由政府出资，紧密结合产业和企业的需求设置课程，鼓励企业为各种培训提供学习场地和技术人员，再根据市场价折算对员工的教育培训费用，采用更灵活的积分制，通过学分累计获得学历。进城务工人员修完高中或者修完某项技能，政府给予相应的支持，这对他们提升自身素质有很大好处。留守儿童问题本身和父母自身的教育、素质有一定的关系。相对来说，文化层次越高的人，越是意识到亲子交往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对务工人员的教育也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事情。

- “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城市儿童，父母的素养提升了，父母对教育的理解深刻了，对孩子的教育成长就会更加关注。”

记者：您刚才说到留守儿童父母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这跟他们自己家庭也有很大关系。您曾提到“家庭教育指导师计划”，该计划用来解决留守儿童治理问题，能否产生一些效果？

朱永新：我们看到统计，数百万留守儿童里，有一半以上一年也见不到父母一面！这个数据说明：一方面父母有生存的压力，要打工赚钱；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照料教育孩子的意义、价值关注得不够。我是中国教育协会的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这些年我们在推进新教育的过程中发现，教育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问题。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城市儿童，父母的素养提升了，父母对教育的理解深刻了，对孩子的教育成长就会更加关注。家庭教育的指导

师不是我们首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前几年一直在做。我们从去年开始帮助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培养家庭教育指导师。另外，我们跟广东全通教育公司合作，做了一个“新父母大讲堂”，组织专家在全国举办公益讲座，讲座分三种类型，其中一类便是以“关爱留守（流动）儿童”为着眼点，面向劳务输出大省、偏远地区以及留守、流动儿童的父母集中的地区进行公益巡讲。这是“新教育”实验十多年探索的成果——不仅要让孩子受教育，父母也要受教育。在北京、江苏等全国的很多新教育实验学校已经建起了“新父母学校”。我们会出版一套《新父母学校的标准化教材》，希望父母们比较系统地去学习教育知识。我们还计划通过网络，给全社会无偿提供家庭教育的理念，同时我们与高



等教育出版社合作做“新父母大讲堂”，邀请国内的家庭教育专家演讲、交流，把资源和全社会共享。我们希望让更多父母尤其是留守儿童的父母懂得家庭教育和亲子交流的重要性，普及家庭教育的理念。我们过去总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情，事实上父母素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孩子在进入学校之前，人格发展、个性特征、习惯养成，都是在家庭中形成的。一定程度上说，孩子是由父母造就的。

家庭教育，是个长期性的工程，不是一

年两年就能见效的。我们要在中小学、大学的课程里加入家庭教育的知识，加强学生们对如何做父母的认识，给他们未来埋下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所以，教育内部的事情，要先从教育自身突破，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影响孩子。我们做的“新孩子乡村公益行”就是一种影响，我们进入了100个乡村，尽管与全国乡村的数量相比不算多，但是，如果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影响一对父母，就能影响一个家庭，包括他们的孩子。“留守儿童”这个词，应该可以从新时代的字典上消除！

- “家庭监护、政府责任、教育任务、群团组织、财政投入五个维度都很重要，需要五管齐下。最关键的还是要强化制度保障，没有制度安排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

记者：国务院今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从家庭监护、政府责任、教育任务、群团组织、财政投入等诸多方面采取措施，您如何看这五个维度的重要性？

朱永新：都很重要，需要五管齐下。最关键的还是要强化制度保障，没有制度安排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第一，法律要保障父母和孩子不能分开。在国外，父母离开孩子几个小时，邻居都可以打电话报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也规定了父母要照料、陪伴自己的孩子。因此，父母去打工，也必须带上孩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除非父母没办法履行监护的义务，特殊情况下可以指定监护人，这是国际通行的规则。第二，规定父母和孩子不能分开，就需要创造条件，要让他们有基本生活的条件，首先要解决住宿、读书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完全靠用人单位解决有难度，政府可以提供保障房，用人单位、地方政府协调解决。居者有

其屋，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第三，孩子要有人照看。要着力解决在幼儿园有看护、在学校有书读的问题。第四，如果夫妇两人收入养不起孩子，政府的低保应该惠及这些流动人口，用人单位也应该去帮助他们解决。

记者：您谈到“留守儿童这个词，应该从新时代的字典上消除”，在您的预期里，您觉得有没有一个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表？

朱永新：我希望“十三五”期间至少这个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说父亲母亲还不能跟孩子在一起，还有大量留守儿童，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相信，随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各方面积极有效的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进程会加快，应该不要等到2020年。 

（责任编辑：杨婷）